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青年学术文库

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 和农村政治

王明前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青年学术文库

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 和农村政治

王明前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和农村政治 / 王明前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161 - 0822 - 2

I. ①太… II. ①王… III. ①太平天国革命—研究
IV. ①K254.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343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叶昕媛
责任校对 高 婷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4
插 页 2
字 数 381 千字
定 价 5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阶级分析论的贫困:太平天国研究

阶级分析论范式批判(代序)

太平天国史研究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文化大革命”后十年为中国史学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由于历史原因，阶级分析方法成为研究的主流倾向。阶级分析方法的学术价值虽然毋庸置疑，但是其绝对化倾向长期禁锢太平天国研究界的学术视野，使这一研究进入 80 年代后逐渐式微。因此有必要总结阶级分析论方法，为重建太平天国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笔者发现，阶级分析论者对太平天国的研究普遍存在以下三种方法论误区：

首先，阶级分析论者习惯用《天朝田亩制度》（以下简称《制度》）作为衡量起义者实际施政的尺度，进而认为太平天国起义者具体的农村政治正是基于《制度》精神的实际体现。这样，《制度》的思想史价值和其本体的认识论意义，与起义者实际的农村政治实践被人为混淆。而对于起义者具体的农村政治实践，即便与《制度》文本的差距很大，阶级分析论者仍然坚持认为，所有起义者的具体实践都是在落实《制度》的精神。

如太平天国史宗师罗尔纲先生在评价前期的“照旧交粮纳税”和后期的“着佃交粮”政策时认为，这两项政策正是《天朝田亩制度》精神的变通。他这样解释：“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因天京缺粮的紧急情况，不得不采用‘照旧交粮纳税’措施。它根据具体的情况，顺应农民的愿望，先行‘着佃交粮’政策，一反千余年我国田赋制度的常规，变地主交粮为佃农交粮。其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进一步颁发田凭，宣布凡佃农领凭后租田概做自产，把土地所有权从地主转移到佃农手中，实行‘着佃交

粮”，广大地区的佃农得到了自己所耕的田。太平天国并没有颁布耕者有其田政策，而在它所施行的土地政策的结果事实上竟成为耕者有其田了。”^① 为论证方便起见，罗老对田凭做了区分，一为“专作为地主收租证明用的”；一为“从着佃交粮政策向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而颁发的太平天国新土地证凭证”，两者“名同而实异”。^② 这种认为具体施政正是《制度》精神体现的倾向，在阶级分析论者的论著里并不鲜见。如郭毅生教授也将“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与《天朝田亩制度》相联系，认为“《天朝田亩制度》的分田法因不具备施行的环境，而它的农村‘国库’制是不符合农民意愿的错误主张，不能贯彻施行”，同时“1854年夏季时，天朝总圣库告匮，天京发生粮荒，亟须筹措军需与民粮”，导致太平天国被迫实施“照旧交粮纳税”政策。^③

这一长期统治太平天国研究的思维定式，实际上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天朝田亩制度》的研究理应有自身独立的研究价值，而决定起义者农村政治历史价值的，应该是他们的实践本身。《天朝田亩制度》的价值只能部分确立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地位，远非全部。太平天国的农村政治绝对不应该以《天朝田亩制度》是否实现或实现多少为考量标准。太平天国的农村政治自有其独特的规律，这种规律也不是可以通过《天朝田亩制度》的标准来衡量的，其动因自成系统。

而如果具体观照太平天国农村政治实践本身，它其实是在遵循着一条独立于《天朝田亩制度》文本精神之外的规律运作的。太平军从接触农村社会，直到建立稳定统治，一般经历三个呈逐级上升趋势的阶段。第一阶段是贡单阶段，其表现特征是征收贡物；第二阶段是门牌阶段，是在恢复和沿袭清朝旧制的基础上，推行以征收传统田赋漕粮为特征的农村政治；第三阶段是田凭阶段，在天国后期一些地区，在李秀成等的主持下，一些太平军贵族会向田主颁发田凭确定他们的土地产权。但即使到这一最高阶段，太平天国仍然没有涉及土地关系的任何变革。这一农村政治基本规律

①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二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09—810页。

② 同上书，第806页。

③ 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173页。

的实现,根本不受《天朝田亩制度》的影响,而是受主政太平军贵族的政治倾向、乡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以及区域政治军事环境这三个变量的制约。于是,纵览太平天国农村政治的实践史,根据以上规律观照,可以描绘出这样的政治地图:天国前期(1853—1858年),在建立较稳定统治的安徽北部和江西,安徽北部太平天国的农村政治基本处在从贡单阶段向门牌阶段过渡的过程中,且征贡特征明显处于强势;而江西基本处于贡单阶段。天国后期(1860—1864年),在建立了较稳定统治的苏福省和浙江省,苏福省的苏州地区,由于基本贯彻了李秀成的地方建设思想,因而实现了门牌阶段的农村政治,甚至部分上升到田凭阶段;而浙江省的农村政治水平呈现较大的区域差异:部分贯彻李秀成建设思想的嘉兴郡基本实现了门牌阶段的农村政治,而宁波、绍兴处于从贡单阶段向门牌阶段过渡的过程中,且征贡政治的特征明显,浙江其他太平天国占领区则基本上处于贡单阶段。

在有效剥离《制度》文本与起义者具体实践的前提下,太平天国的三个特色社会经济政策也因此可以摆脱《制度》决定论的羁绊。前期的“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实际上是定都天京后,随着西征的展开和战略任务的转变,即由流动作战式的走州过府,到以天京为中心开辟针对清朝的王朝战争基地的转变,很自然采取的社会经济政策,而且是一个自然的过渡,与《天朝田亩制度》的实施条件与否没有必然逻辑关系。后期苏福省、浙江省当局普遍实行的“着佃交粮”政策,实际上是与“招业收租”并举的。“着佃交粮”不仅没有改变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土地所有权关系的现状,也没有减轻佃农的实际社会负担,因此不具有任何社会经济变革意义。太平天国当局颁发田凭的政策,并不能作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发挥革命性作用,因为它仅仅是对现有土地关系的确认。而阶级分析论者津津乐道的吴江监军钟志成推行的授予实种佃农土地所有权的田凭政策,尽管具有了土地革命的意义,但是由于属于孤例,且钟志成本人并非太平军主政贵族,所以不具备普遍意义,更不能够认定是太平天国农村政治发展的必然归宿。

其次,阶级分析论者一般都想当然地认为,作为农民起义的太平天国起义者所建立的政权,必然是一个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革命政权。这样的

政权，在具体施政上，其阶级倾向理所当然是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自然也就是反对地主阶级利益的。于是，太平天国的地方政权理应掌握在农民阶级手中，代表农民阶级利益去打击地主阶级。而如果不这样做，则说明这个政权被地主阶级分子篡夺。

如董蔡时同志以“太平天国革命是一次农民革命，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作为立论基础，认为“太平天国的乡官多数是劳动人民，但是也有一些地主分子窃夺乡官职位，这是地主阶级的一种反革命手法，绝不能以此作为太平军与地主阶级不相对立、排斥的论据，并且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便是这种“阶级分析论”的典型论点。^①而王天奖同志虽然以“无论在太平天国前期还是后期，充任太平天国乡官的大多数不是劳动人民，而是地主阶级分子”作为反驳，^②但仍然不脱离阶级分析论的思路。总之，以上观点把乡官的组成成分与政权性质与否相联系。他们假定太平天国政权为维护自身的所谓阶级性质，理所当然地应该多使用农民阶级出身的人士出任乡官，反之，如果乡官中地主阶级人士占优势，则说明农民政权发生了蜕变。

其实，站在历史当事人的视角去认识太平天国政权，才是一种更客观的研究态度。太平天国任用乡官的标准，是建立在太平天国地方行政的政治需要之上，而并非阶级分析论者所假定的阶级立场之上。出于以征收粮赋为重点的传统地方行政的需要，太平天国着意与精通传统行政事务的地方名流合作。虽然这些地方名流的阶级出身往往不能令阶级分析论者满意，但是从社会功效的角度来看，太平天国当局正是通过发挥这些地方人士的行政优势，才很好地弥补了自身行政经验的不足。这一点在后期的苏南和浙江占领区表现得很充分。比较前期在安徽和江西的表现，他们通过发挥具有丰富地方行政经验的地方人士的主观能动性，不仅成功提高了自己的行政水平，也有效缓冲了自身对农村社会的负面冲击。

最后，和上述关于政权性质的观点相关，阶级分析论学者们既然认为

① 董蔡时：《太平天国的乡官多是地主分子吗？》，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上），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722页。

② 王天奖：《太平天国乡官的阶级成分》，《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上），第702页。

太平天国起义者是代表社会正义的农民英雄，太平天国政权是代表农民利益的革命政权，因此他们对太平天国人物的评价便单纯根据这个人物对太平天国政权的政治忠诚而定夺。于是，一个太平天国人物，只要他是在和清朝的战争中牺牲的，只要他没有背叛太平天国政权，那无论他在农村政治上具体表现如何，都会得到一个农民英雄的美名；反之，如果这个人物在战争中背叛了太平天国政权，而这在后期的太平天国是十分寻常的事，则无论他在农村政治上有如何卓越的贡献，都将因为所谓政治污点而被藐视甚至忽略。其实，这仍然不过是中国传统的重道德水准而轻实际才干的历史观的表现，只不过又被阶级分析的立场进一步强化为革命立场标准。这样的评价首先左右了学界对杨秀清的评价。由于杨秀清的僭主政治损害了被阶级分析论者一致认可的革命领袖、拜上帝教创始人、太平天国君主洪秀全的地位和利益，则无论杨秀清对太平天国历史的贡献如何，阶级分析论者都会默认洪秀全编织的杨秀清“逼封万岁”的政治谣言。而受到阶级分析论者伤害最严重的太平天国人物无疑是李秀成。只是因为他临难前写下了洋洋万言的自供，他对农村政治建设性的思考和实践，便被长期埋没。被阶级分析论者贬入学术冷宫的又岂止杨秀清和李秀成，而是整整一个具有儒家化倾向的施政群体。为了树立他们理想的农民英雄形象，阶级分析论者将贪婪残暴、嗜杀成性的常熟首任主将黄文金奉为英雄，而仅仅因为其最后叛变太平天国政权，便无视后任主将钱桂仁体恤民情，站在农民立场上纠正乡官局地方行政腐败的善举；在他们的心目中，滥杀无辜百姓、顽固推行残暴野蛮的征贡政策、大敌当前又丧失斗志的绍兴主将陆顺德，因为在太平天国中央政权覆灭后仍然坚持战斗而死，便成就了农民英雄的名节。而在陆顺德的压制下艰难推行“着佃交粮”良性农村政治的副将周文嘉，即便其在反侵略斗争中有着非凡表现，也仅仅因为最后参与了苏州叛降，而在阶级分析论者的著作中被咒骂为可耻的叛徒，其英雄事迹湮没无闻；更不用说给绅士地主沈庆余颁发护凭的邓光明，他明目张胆地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行为，理所当然被认为是他日后投降的先兆。即便农村建设的明星钟良相，早在太平天国失败前便得善终，根本不涉及政治名节问题，其在嘉兴推行的堪称仁政的良性农村政治，也因为鼓吹社会合作，不符合阶级分析论者的所谓阶级立场，也最终难逃一个阶级异己分子

的骂名。于是，阶级分析论者的著作，仿佛一座座以太平天国官方立场树立的忠烈祠。在一尊尊先烈牌位的背后，生动鲜活的历史内容被无情抹杀了。

其实，阶级分析论者们所欣赏的英雄和他们的行为，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违背中华民族重视人文关怀的主流政治文化的政治逆流。他们激进的文化政策极大地疏远了他们与恪守儒教精神的中国农业社会的距离。这些阶级分析论者理想的农民英雄们对包括儒教在内的各种宗教和意识形态横加挞伐，特别是对儒教极尽打击之能事，对正统儒学士人根本不加体恤。黄文金、陆顺德之流更是视民众生命为草芥。但在太平天国政治史上，与这股主导性的政治逆流相反，存在着一条试图纠正这股逆流以挽救太平天国起义命运、为天国争取更广阔社会资源的儒家化的政治轨迹。这一“儒家化”政治轨迹，起始于杨秀清的“儒家化”思路，成熟于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而只有在钟良相的“濮院仁政”里，才真正实现了儒家理想的“仁政”。特别是在天国后期的苏福省、浙江省，在李秀成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个具有良性施政倾向的太平军贵族群体。他们主动改变征贡习惯，积极寻求与地方社会合作，追求安居乐业的社会秩序。

本书试图对上述阶级分析论研究范式做出修正。

第一章为时代背景分析。第二章探讨太平天国政治文化的渊源。第三章至第五章集中纠正阶级分析论研究范式。其中第三章重点批判阶级分析论以《天朝田亩制度》作为衡量太平天国政治水平标准的理论误区，探讨这一纲领性文件自身独有的理论价值。在此基础上，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提炼太平天国农村政治的基本规律和政治的儒家化轨迹。第六章至第十三章分前后期分别探讨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与农村政治。第十四章为太平天国官制研究。第十五章探讨太平天国起义在近代史分期框架中的意义。

目 录

阶级分析论的贫困:太平天国研究阶级分析论范式批判(代序)	(1)
第一章 太平天国起义前中国农村社会的社会生态	(1)
第一节 太平天国起义前广西社会概况	(1)
第二节 太平天国起义前的江南社会	(7)
第二章 太平天国政治的文化继承	(13)
第一节 中西文化的熏陶与太平天国政治	(13)
第二节 太平天国政治的客家渊源	(21)
第三章 《天朝田亩制度》辨正	(32)
第一节 《天朝田亩制度》田政考	(32)
第二节 《天朝田亩制度》乡政考	(40)
第三节 《天朝田亩制度》“反动性”辨	(52)
第四章 太平天国农村政治的基本规律	(65)
第一节 太平天国农村政治的基本规律	(65)
第二节 影响农村政治基本规律的变量	(74)
第三节 太平天国乡官的任用标准与社会功效	(80)

第五章 太平天国政治的“儒家化”轨迹	(92)
第一节 杨秀清的“儒家化”思路	(92)
第二节 李秀成地方建设的新思维	(95)
第三节 钟良相“濮院仁政”	(104)
第六章 杨秀清僭主政治	(115)
第一节 杨秀清僭主政治的形成与运作	(116)
第二节 杨秀清政治权威的强制性与诱导性	(133)
第三节 杨秀清“逼封万岁”考谬	(142)
第七章 太平天国前期农村政治研究	(156)
第一节 太平天国前期农村政治二题	(156)
第二节 太平天国安徽农村政治	(163)
第三节 太平天国江西农村政治	(169)
第八章 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重建君主权力的努力	(179)
第一节 太平天国后期权力结构概述	(179)
第二节 洪秀全重建权力中枢	(181)
第三节 上帝家庭与太平天国政治	(191)
第四节 洪秀全、李秀成权力斗争的心理定式	(198)
第五节 洪秀全之死	(202)
第九章 太平天国后期中央宫廷贵族与洪仁玕新政	(210)
第一节 中央宫廷贵族概述	(210)
第二节 洪仁玕中央集权政策的失败	(214)
第十章 太平天国后期地方军事贵族与后期地方政权的本土化	(221)
第一节 太平天国后期地方军事贵族的演变	(221)
第二节 李秀成政治性格探析	(235)

第三节	太平天国后期地方政权的本土化趋势与中小军事贵族的专横·····	(241)
第十一章	太平天国后期农村政治概述·····	(253)
第一节	太平天国后期农村政治二题·····	(253)
第二节	后期儒家化农村政治的时代土壤·····	(263)
第十二章	太平天国苏福省农村政治研究·····	(266)
第一节	苏福省农村政治综述·····	(266)
第二节	苏州三县农村政治·····	(268)
第三节	常熟县农村政治·····	(272)
第四节	吴江县农村政治·····	(278)
第五节	苏福省其他地区农村政治·····	(284)
第十三章	太平天国浙江省农村政治研究·····	(291)
第一节	太平天国浙江省农村政治概述·····	(291)
第二节	嘉兴郡农村政治·····	(295)
第三节	绍兴、宁波、湖州郡农村政治·····	(303)
第四节	金华、台州、温州农村政治·····	(309)
第十四章	太平天国官制的基本原则与前后期变化·····	(316)
第一节	太平天国前期官制实施的基本原则·····	(316)
第二节	太平天国后期官制的新变化·····	(321)
第十五章	中国近代史开端 1861 年说——近代史分期 框架下的太平天国起义·····	(330)
社会运动理论上太平天国研究重建的尝试(代跋)·····		(341)
一	“政治机遇”视角下的太平天国起义·····	(343)
二	太平天国运动的“斗争构造”与“政治认同”·····	(345)

三	“居间联络机制”下的太平天国政治·····	(349)
四	太平天国运动的“斗争周期”·····	(350)
参考文献 ·····		(354)
后记 ·····		(369)

第一章

太平天国起义前中国农村社会的社会生态

太平天国起义兴起于广西客家山区，最后发展到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特别是苏南和浙江建立起较稳定的统治，并实施农村政治。广西策源地与江南实践场，地理空间相距数千里，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迥异。因此史学界习惯于对这两个地理单元做单独研究。然而笔者发现，无论是贫瘠的广西边地，还是富庶的江南水乡，其社会生态均表现出同样的特点，即由于人口与土地的矛盾而导致的土地问题和由于地方行政腐败而导致的社会不公正。因此笔者有意将广西和江南这两个地理单元合在一起研究，作为太平天国起义的背景分析。

第一节 太平天国起义前广西社会概况

太平天国兴起于广西，其行为方式与制度受广西社会，特别是客家社会浸染颇深。广西是清代中国的落后地区之一。无论经济总量，还是文化贡献，都无法与富庶的江南地区相比。广西人口虽然从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113.6万逐渐增长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763.3万，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咸丰元年（1851年）更增长到782.3万，但是耕地面积却仅从1661年的53939顷增加到89620顷。^①广西的经济总量尤其可怜。广

^①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0页。

西每年征收的地丁银为 69 万两，而经济发达的江苏和浙江则分别为 358 万两和 280 万两，而且江苏和浙江还有漕粮负担。^① 地丁银是清朝最重要的财政收入，代表着一个地区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水平。从广西与江苏、浙江这方面的巨大差距，可以想见广西经济水平的落后。

广西境内山岭横亘，与外界交通不便，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浔州府志》记载：“道光十三年癸巳，桂平蝗。十四年甲午夏，浔州蝗，复大水。七月初七日，桂平大宜里鹏化、紫荆、五指三山水同发，平地深三尺，岁大歉。十五年乙未，平南蝗食草木，百谷殆尽。十六年丙申，平南再蝗。十七年丁酉春三月朔，浔州雹，大如斗。二十年庚子六月，浔州大旱。道光二十八年八月至十二月，大旱。”《贵县志》载：“道光十三年癸巳，飞蝗遍野。道光十七年丁酉，淫雨连绵。河水泛滥及城厢内外…禾稻失收。道光二十八年戊申，飞蝗蔽日，如飘风骤雨之至，飒飒有声，所下之处，禾苗菽麦嚼食一空。”^②

如此恶劣的农业生态使广大农民生活在近乎绝望的境地，而腐败的地方吏治更加重了农民的苦难。嘉庆、道光以来全国范围内由于税收弊端引发的社会矛盾，在贫瘠的广西也很尖锐。《民国陆川县志》载：夫广西之民，身之有丁也，既税以钱，又算以米，是一身而输二税。殆前世弊法，今既未能除，而又益以役钱，甚可悯也。……清初沿前代旧制，地丁分二项征税。查陆川职田、民田及民塘，既征亩税科粮米，又编征四差银，是敷之田米也，而人丁复有税，是一身而输二税也。^③ 税制混乱之外，因胥役包揽田赋征收而导致的弊端，尤其积重难返，“初，县征收田赋名目繁多。每届上下忙，悉由各卯铺包揽征收，小民输纳时，恣其鱼肉，吆喝恐吓，无所不用其极，大为地方之害”。^④ 在这些把包税“视同世业”的胥吏把持下，小户自然要比大户承受更重的盘剥。《民国隆安县志》载：“嘉庆庚辰，

① 龙盛运：《太平天国革命策源地广西试探》，北京太平天国史学会：《太平天国学刊》第二辑，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281 页。

②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编辑组：《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中华书局 1978 年版，第 14—15 页。

③ 同上书，第 12 页。

④ 同上书，第 9 页。

钟皆山邑侯蒞任伊始，有不肖之户科除干办银一千两外，更增加月规一款，月加银一百五十两，一年该银一千八百两……于是暗设金字号，征银一两以上谓之大户，九钱以下者谓之小户。征银九钱纳更多于一两，征银八钱者纳更多于九钱。类而推之，愈小而愈加，甚至于分厘之莫可纪极者。行之数十年间，几为常例。”^① 在吏治腐败的同时，广西土地占有日益集中于少数大地主手中。如平南的土地状况，在乾隆、嘉庆后便日益集中，鸦片战争后情况更加恶化，“总计地主占有全部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② 而桂平县的甘皇岭村，“全村耕地面积四百多亩，本村人占地一百六十亩，约三百亩田地为外村地主占有，全村大多数人没有土地，只好租种别人的田”。^③ 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地金田村在起义的前夕，土地集中的情况也很惊人。“全村水田约七百五十亩，全村人口约三百二十人，韦氏家族和谢氏家族占有一百十亩，另有八户各占有土地四至十亩不等的土地。而其余的人共有土地六亩，其中绝大部分无土地。全村人口共占金田村范围内土地共二百八十多亩，还有四百四十多亩为外村大地主占有。”^④ 土地集中问题除了以上占有绝对数量的不均外，土地肥瘠不均也是重要表现。如桂平县土地，有山居、陆居两种。“山居去江远，而无水患。山下出泉，雨则山上流水尽会田中，祁祁半天，胜于平原两日之霖，加以闸堰涧溪之挹溉而无旱患。枯草腐木堆积在上，随雨坠田，故土深泥腴而无瘠患。因是，本微利巨，劳少功多，勤者为两造。怠者一造已足”，但是“其田多为富室所有”。而陆居土地则由于“黔、郁两江面狭岸高，春夏水涨骤溢”，受季节水文影响过大，水旱灾害频繁，“故三年之耕，恒不足供两年之食，甚或一年之耕，不能酬一年之种”。^⑤ 土地的集中必然伴随着残酷的地租剥削。这在乾隆、嘉庆时期广东客民大量涌入广西后变得日益突出。桂平“山间佃众田

①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编辑组：《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第10页。

② 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页。

③ 同上书，第15页。

④ 同上书，第12—13页。

⑤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编辑组：《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第12—13页。

稀，供不及求，谋耕急切，则租约必重。岁万供所获之半于田主，自非岁时大变，则成分不能稍减……又山中距江既远，故佃租必每石加十斤或二十斤，以作田主运销之费，租或短供，则易佃之声立至。处舟舶不通之地，力稀而外谋生之路少。上者远出地方，居肆作匠，次则执鞭巨宅，领略馥余，下则奔伺公门，厕身皂隶”。^①道光年间，桂平大宣里的田租，“大多是百种千租，随后就增加到百种二千租”。贵县庆丰村的地租，“最初是四成五成，后来收到六成七成”，该村地主邓石梅的“田租占收获物的百分之八十”；湛江村则“每年田租要交收获稻谷的一般以上”。平南的地租，“一般占佃户收获物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武宣东乡的地租“一般占收得净谷的六成”。^②可见，地租占到收获物的一半以上，在广西属于正常现象。

如果说以上社会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均属于普遍现象，只是在广西表现得特别尖锐的话，那么以下三类社会因素则为广西所特有，并且加剧了广西社会生态的恶化。

其一为落后的文化。这直接影响了广西地方官与绅士的政治敏感度和应变能力。广西文化在全国的落后地位是与广西落后的社会经济水平相适应的。比较清朝顺治到道光年间，各省入翰林院的士子数，经济发达的江苏和浙江各为 690 和 580 人，而广西则为区区 91 人。总体文化水平的落后还表现在文化与学术贡献上。《清代学者著述表》所统计的作家共 1392 人，江苏和浙江分别为 417 和 308 人，而广西只有区区 9 人。^③广西本省士子出官入仕的机会远逊于文化发达的省份，这一现象势必会影响广西绅士阶层的行政能力。更致命的是，面对山雨欲来的危急局势，广西士大夫却沉湎于对桐城派古文家的追逐模仿之中。“这种情况一方面使他们不敢也不可能对失职大吏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广西地主阶级也不可能自行采取有力措施来镇压农民起义。”^④而广西的邻省湖南，虽也正面临着天地

①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编辑组：《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第 12—13 页。

② 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第 10—11 页。

③ 龙盛运：《太平天国革命策源地广西试探》，北京太平天国史学会：《太平天国学刊》第二辑，第 285 页。

④ 同上书，第 311 页。